

一家六位侨联常委、两位政协常委

——记归侨赵天助家族的故事(三)

时，他参与了保卫周恩来总理的工作。两次排华事件中，他做了大量帮助难侨回归祖国的工作。还协助中国驻印尼泗水领事馆做翻译工作。

树欲静而风不止。1967年，赵启泰被说成是“共产党”，面临被拘捕的风险。他带着妻小一家6人，只好连夜逃走，撇下了所有生意和资产。到了广州，上岸一看，满城的大字报。

回到厦门，总算平安与家人团聚。但没多久，有大字报贴出来，说赵启泰是“台湾特务”。被限令在48小时内从虎园路的大宅子里搬出，至于一家子二三十人何去何从，没有答案。几个小家庭或投奔亲友或寻找临时住处，四散而居。

1972年，赵启泰迁居香港，后来与数位好友合资成立了百希达公司，任董事、总经理。他不计前嫌，积极为厦门引进技术、资金而穿针引线。厦门罐头厂的第一条自动化生产线是从台湾引进的，比厦门第一家外资企业印华地砖厂更早，其中牵线搭桥的人就是赵启泰。百希达公司主

营土特产业务，业务分布在全国各地。赵启泰做这个生意有个奇怪的原则，双方一定要双赢，损害祖国利益的业务，哪怕利润再高也不干。

在香港，赵启泰还做了大量接待内地赴港代表团的工作，厦门、北京、青岛等地都有，为他们提供了很多国外的商业资讯。

赵启泰回到厦门期间，历经大起大落，但他淡定从容。回忆往事时，他从不咒骂命运的不公。他也没有灰心丧气，哪怕在最低落的时候，他也告诉家人“祖国会好的”。他是位严厉又可亲的大哥。有次开政协会，担任厦门市政协常委的他坐在主席台上，看到台下弟弟与邻座窃语，回到家中，他批评：“开会要认真”。长兄如父，赵启霖延续了端正爱国的家风。

三哥赵启霖

赵启霖1931年出生于印尼。他很有经商头脑，留在印尼将生意经营得红红火火。1960年3月，他回到厦门探望父母弟妹。8月下旬父亲病重住院，9月初

病故。面对年老体弱的母亲和还在上学的弟妹，他毅然放弃在泗水的富裕生活，留在了厦门。时局的缘故，一年后，他新婚的妻子和一岁的幼儿，好不容易才回到厦门团聚。

赵启霖被安排在厦门市侨联工作，只是普通干部，领着30元的月薪，这位曾经的富家公子没说什么，安心踏实地干起来。华侨味精厂早期使用人力提炼，他干过；华侨幼儿园、华侨托儿所、华侨中学的建设，他参与过，其中担任过华侨中学的校董；侨利面包厂、侨光电子元件厂、香港百希达公司与厦门市侨联合资的侨达方便面厂，他也是建设者。上世纪八十年代，香港百希达公司在厦门设立代表处，他担任首席代表。

1971年，经批准，赵家在白鹤路盖了幢不大的小楼。1980年代末，落实侨房政策，虎园路的老房子得以回归赵家。赵启霖回到这座充满回忆的宅子，安度晚年。

六弟赵启安

赵启安1941年

出生于印尼。回国时，他年龄尚小，先进入了集美侨校读书，1955年8月转入厦门四中（现大同中学）。

1958年高中要毕业了，正赶上大跃进。当时福建省正准备上马化工厂，缺化工技术人员，省教育厅决定将厦门四中改为厦门化工学校，高三年段全部转为化工机械等四个班。

赵启安是侨生，本可以照顾转入其它普通高中，之后参加高考的。但他响应党的号召，豪情满怀，不顾父母亲的反对，还是和同学们一起读化工学校。1960年毕业，留校任教。

没想到，1962年，国家经济困难，赵启安因侨生身份被学校精简，第一次尝到了失业的苦味。经自学参加高考，他于1963年考上了厦门大学外文系。这一年赵家是双喜临门，妹妹赵玉华考上了福建医学院。

在大学里，赵启安品学兼优，担任大班班长、团支部书记，青春作伴，岁月如歌。谁也没想到，文革的到来给国家和个人的命运都带来巨变。赵家受到了极其

沉重的冲击。父亲回国购买的家没了，母亲、兄弟姐妹只能投靠亲戚。在校的赵启安也因家庭出身被批为“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”，这一切伤透了赵家所有人的心。

1968年，赵启安到福清一个军垦农场劳动一年半。1970年，被分配到上杭县当乡村教师。直到3年之后，组织上通知他可以回到厦门大学外文系报到，赵启安却选择了到厦门大学图书馆工作，他只想躲进小楼成一统，安安静静地生活。

期间，厦门市侨办、致公党厦门市委都会都想来调用他，但厦门大学挽留他：“图书馆需要人”，赵启安服从组织安排，担任馆长助理，在故纸堆和书香间一干就是17年。

1981年起，赵启安担任了一届市人大代表、四届市政协委员，四届市侨联委员和厦大侨联第一、二届副主席和第三届主席，作为侨界代表参政议政，同时为更多侨界人士服务。

1981年12月，经省、市侨联和校党委的批准，厦门大学侨联成立了。成立侨联，这在全国高校中